

## 後冷戰時代中美俄三角關係的演變

◎ 鄭羽

### 一 後冷戰時代是否依然存在中美俄三角關係

經典意義上的中美蘇三角關係存在於1972–89年間的冷戰年代。1972年《上海公報》的簽署表明，中美聯手抵制蘇聯霸權主義的共識已經達成，並成為當時中美雙方各自作出妥協並大幅改善雙邊關係的最主要動力。隨著1989年5月中蘇關係正常化、美國宣布實施「超越遏制」的對蘇政策，以及同年12月蘇美馬耳他高峰會後宣布冷戰結束，這種三角關係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美俄學者普遍認為，兩極格局解體後的今天仍然存在著某種性質的中美俄三角關係，只不過對其作用和影響力的估計有所不同。

美國學者認為：「公平地說，三角的考慮影響了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政策」，「中國和俄羅斯在對美國的態度具有某種共識。雙方都渴望縮小美國單邊主義行動的範圍，並且在某種場合它們可能合作來推進這一目標。」但對美國來說，「美俄中三角關係不是最重要的三角關係，美國對俄政策一直與美國對歐洲的政策有著緊密聯繫，而美國的對華政策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有同步性。」<sup>1</sup>

另一位美國學者也認為<sup>2</sup>：

中俄兩國在90年代形成了較為緊密的關係，以致力於反對它們意識到的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趨勢，但這與50年代的中蘇同盟關係有著很大的距離。由於在對外政策上的利益矛盾和在經濟與地區關係上的困難，中俄夥伴關係有很大的局限性。

俄羅斯學者對於俄美中三角關係的系統論述並不多見，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的一位學者寫道<sup>3</sup>：

對於俄國和中國來說，與美國的關係顯得特別重要。每一方都希望自己與華盛頓取得滿意的關係。從美國方面來說，也存在同樣的興趣。……在這「三套車」中的任何兩個夥伴都不可能形成反對「多餘的第三者」的統一戰線。

另一位俄羅斯學者認為<sup>4</sup>：

俄羅斯與中國都尚未放棄試圖從對方與美國的矛盾中撈取好處的做法。在90年代，莫斯科積極拉北京反對華盛頓的北約東擴和建立全國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而北京則利用俄美關係在這兩個問題上的矛盾來為自己撈好處：從俄羅斯獲得軍事技術上的好處，從美

國獲得經濟上的好處。

顯然，美俄學者雖然對中俄之間協作關係的穩定性存有疑慮，但也都承認某種新型三角關係的存在。

在筆者看來，後冷戰年代新型中美俄三角關係形成的國際環境，是美國維護單極霸權的政策與俄羅斯和中國戰略利益的衝突。

蘇東集團解體後，中國在美國對蘇戰略中的借助作用消失，中美在社會制度和人權政策上的矛盾，導致兩國關係在1989—97年陷入低谷。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突出了中美兩國在後冷戰時代關於新的世界秩序和地區秩序問題上的理念矛盾和現實的政策衝突。這不僅使擬議中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難以實際建立，而且使雙邊關係經常處於動盪之中。中國政府切實地感覺到，在中國實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美國對華政策實際上構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脅，而由於雙方力量懸殊，中國必須尋找夥伴來盡可能牽制美國的政策形成，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關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90年代中期，俄羅斯對本國國際地位和國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不僅導致了對西方「一邊倒」政策的終結，也在客觀上使俄美分歧在一系列領域開始出現並有所擴大。俄羅斯關於多極化的主張及政策，構成了對美國單極霸權的挑戰，也表明政治轉軌完成後的俄羅斯仍然是西方世界的異類。實力大減的俄羅斯同樣需要國際舞台上的合作夥伴。

無論是奉行美國霸權下的大國合作戰略（1999年以前）還是單邊主義戰略，美國都是在按照單極霸權的意願整合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權力體系和國際秩序，必然將在某些方面能夠對美國單邊主義政策提出質疑的中俄兩國視為主要競爭者，並對兩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根本傷害。

中俄兩國關係的非結盟性質，使兩國在戰略協作機制下仍然作為國際政治舞台的兩個獨立力量主體發揮著作用，沒有成為與美國對立的單一中心。而且，中俄之間戰略合作的緊密程度和領域，都在隨著國際形勢改變而出現較大的變化，特別是「九一一」事件之後，更是如此。

## 二 「九一一」事件之前中美俄三角關係的形成和演變

後冷戰時代中美俄三角關係的基本框架是在90年代中期形成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宣布自己是蘇聯國際法地位的繼承者，但很顯然，獨立之初的俄羅斯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已經不能與蘇聯時代同日而語。獨立之初的俄羅斯首先選擇了向西方「一邊倒」並與中國保持睦鄰合作關係的政策。

在對美政策方面，當時的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在其闡述本國外交基本構想的一篇文章中，對此作出了清楚的表述：「在遵循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的基礎上同西方國家建立夥伴關係和盟友關係」，其目的在於，「使俄羅斯和諧地加入國際民主社會及世界經濟聯繫。參與包括全球和地區穩定與安全問題在內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進程的調節系統。保證俄羅斯經濟改革獲得政治、經濟、財政、技術及專家的支援。」<sup>5</sup>

1992年12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首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其對華關係的政策定位是「中國和俄羅斯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她們將按照聯合國憲章，本著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發

展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sup>6</sup>。

很顯然，獨立之初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是希望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建立同盟關係，以解決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參與世界事務和復興本國經濟的問題，而對華政策的核心則是避免交惡歷史重演和發展鄰國間的合作。這時，中美關係因天安門事件而陷入低谷。1992-93年間，美國政府在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的同時，正忙於組織對俄羅斯的經濟援助，並以此作為俄羅斯民主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sup>7</sup>。在這一時期，三國之間的相互政策之間還不具備關聯性，因此，還談不到所謂的中美俄三角關係。

然而，三國間的關係態勢很快就發生了重要變化。儘管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允諾向俄羅斯提供的援助，在1994年7月以前已經撥出了300億美元<sup>8</sup>，但俄羅斯政府原來期望依靠西方援助迅速擺脫危機的幻想已經破滅。1994年1月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出台，俄羅斯與西方在波黑問題上的矛盾也開始浮現。1994年12月葉利欽總統在歐安會公開指責北約的東擴計劃是在重新分裂歐洲，俄羅斯與西方的蜜月關係這時已經結束。1995年9月，北約政策研究部門發表的《北約東擴計劃研究報告》進一步刺激了俄羅斯，使她意識到西方仍然將她作為潛在敵人，並將東擴計劃看作是對本國西部安全的最大威脅。

1994年6月，美國宣布將對華貿易問題與中國人權問題脫鉤後，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有所緩解。但1995年6月美國國會批准台灣領導人訪美，使美中關係出現了更嚴重的危機。1996年3月，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導彈發射演習，美國派出兩個航空母艦編隊駛近台灣海峽，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中國政府深刻意識到美國實際上是中華民族走向統一和強大的最大外部障礙。

上述俄美關係和中美關係事態的後果是，中俄兩國深深感受到美國政策的傷害而在1996年4月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試圖加強外交合作來牽制美國的對俄與對華政策，並在1997年4月發表了作為雙方戰略協作關係理論綱領的《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宣言》，表示將聯手「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sup>9</sup>。

與此同時，儘管美國的政策使中俄兩國感到咄咄逼人，但在1999年以前，後冷戰年代的美國單邊主義政策還沒有最終形成，美國仍然需要中俄兩國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合作。在90年代中期，美國朝野戰略家一致認為，防止全球秩序及主要制度（包括貿易、金融市場、能源和環境領域）的災難性崩潰，是攸關美國生死的利益。他們認為，為了保證美國的這種全球利益，「美國的資源是有限的」<sup>10</sup>。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中也認為，為了保持全球秩序的穩定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美國領導地位，僅僅依靠北約和美國在各地區的盟友是不夠的，美國必須與非敵非友的地區性大國保持合作。他領導的一個由美國官員和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體還認為：「美國無可選擇地必須領導世界。這是一種建立在磋商基礎上的領導地位。」「美國在下一世紀的世界領導地位的潛在不利條件，是沒有解決的國內問題和因每年的預算赤字而繼續增加的數量驚人的債務。」「我們必須使我們將北約的職責擴大到中東歐國家的公開的計劃與我們將俄羅斯整合到國際社會中的意圖協調起來。……使中國加入到國際社會中來也符合我們的利益。」<sup>11</sup>

在這種戰略考慮下，美國意識到將俄羅斯完全融入西方陣營的方針很難在短時間取得成效，轉而對其採取防範和遏制政策，同時試圖在一些領域維持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例如，美國反覆勸說俄羅斯參與1995年11月《代頓協定》簽署後波黑地區的維和，1997年3月以總統聯合聲明的形式接受了俄羅斯維持戰略穩定的立場和區分戰略和戰術反導武器的標準，並在同年5

月簽署了安撫俄羅斯的《北約—俄羅斯雙邊關係基本文件》。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際，美國開始意識到中國在維護亞太穩定和防止導彈技術擴散方面的重要作用，最終放棄了1989年以來的單純遏制政策，1997年10月邀請中國國家元首訪美，並表示願意著手建立雙方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在對台售武方面也比較謹慎。

可以認為，1996-97年是新的三角關係初步形成的時期，其性質是美國主宰世界構想下的美國與中俄兩國的有限合作，與中俄聯手抵制美國的單極霸權。

1999年3月開始了新三角關係的第二個階段。由於北約第一輪東擴在1999年3月完成，1998年的金融危機使俄羅斯元氣大傷，而美國的GDP在達到九萬億美元後看不出任何衰退跡象，與美國海外利益密切相關的亞太經濟也開始穩定和復蘇。美國政府改變了90年代中期作出的對本國實力有限性的評估和對大國合作的需要，開始以單邊主義的方式解決全球穩定與核安全問題。

1999年3月，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了《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法案》，放棄冷戰結束以來作為美俄關係基石的美俄在核裁軍領域的合作關係，力圖以絕對的技術優勢建立單方面的核安全，從而將在理論上使俄中兩國處於美國的核威懾之下。

1999年3月末到6月初，美國撇開聯合國，不顧俄中兩國的激烈反對，長時間轟炸南斯拉夫，完全排斥了俄羅斯對歐洲安全事務的參與權，「科索沃模式」使車臣和台灣的分裂勢力得到了空前的鼓勵（同年夏季俄羅斯大城市恐怖爆炸不斷，7月8日台灣提出「兩國論」），美國還試圖將台灣拉入亞太戰區導彈防禦系統體系，直接威脅到俄中兩國的國家利益。5月8日中國使館被炸，俄羅斯撤回駐北約代表，以及俄羅斯總理中斷對美國的訪問，更加凸顯了這時中俄兩國與美國的冷和平關係。俄羅斯一位學者甚至認為，上述事態使「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反美趨向自50年代兩國建立軍事政治聯盟以來從來沒有這樣明顯過」<sup>12</sup>。

同時，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真正達到了戰略層面，關注重心由在北約東擴和台灣問題上的交叉支援，進一步擴展到共同堅決反對可能給美國干預車臣和台灣問題製造口實的「科索沃模式」，維護全球核戰略穩定與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和作用。為此，中俄兩國領導人不僅在2000年7月聯合發表了加強戰略協作的《北京宣言》，中俄兩國還在1999-2001年的三年內，聯合有關國家連續三次在聯合國大會和國際裁軍大會提出反對破壞戰略穩定的議案。

能夠比較典型地反映美國在後冷戰年代三角關係思維的事例，發生在布什（George W. Bush）執政初期。由強硬派主導的布什班底，在競選期間就激烈指責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對俄羅斯和中國過於軟弱，主張對兩國實施「強硬的現實主義」（tough realism）政策。這一政策不僅使2001年3月來訪的俄羅斯安全會秘書（相當於美國的總統安全事務助理）伊萬諾夫（Sergey Ivanov，現任俄羅斯國防部長）遭到冷遇，而且來訪者剛剛離去，美國政府就以間諜罪名驅逐了四十餘名俄羅斯外交官。

然而，在2001年4月1日發生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後，布什的班底開始認為<sup>13</sup>：

中國構成了未來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而俄羅斯可能成為遏制中國的潛在的夥伴。作為戰略競爭者的中國正在使亞洲的力量平衡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這種努力必須被制止。為了實施這一戰略，需要較少地注意俄羅斯的國內問題，而更多地關注美俄兩國的安全日程。這一戰略與尼克松在70年代初關於戰略三角的考慮相同，只不過現在俄

羅斯和中國調換了位置。

為了實施這一三角關係的新的政策思路，美國政府開始拉攏俄羅斯而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政策。布什於2001年6月與普京（Vladimir Putin）在斯洛文尼亞舉行了首次會晤，一個月後又在意大利會晤，並且開始對普京讚賞有加<sup>14</sup>。而在2001年4月15日，也即中國政府剛剛釋放在撞機事件中被扣押的美方軍人後，布什就宣稱「將採用一切手段確保台灣的防衛」。美國政府還在同年5月宣布向台灣出售導彈驅逐艦和潛艇等進攻性武器，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九一一」事件的出現為三角關係的發展楔入了新的因素。

### 三 「九一一」事件對三角關係的直接和潛在影響

「九一一」事件的直接後果是徹底摧毀了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重要基石——美國可以奉行為所欲為的國際政策而不必擔心受到懲罰，結束了美國建國以來本土從未受到嚴重直接打擊的歷史。美國本土安全面臨的威脅，甚至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和德國一旦完成了亞歐戰事後可能揮師北美大陸的那種潛在威脅。這迫使美國史無前例地將本土安全置於國家安全戰略的首位，從而導致了美國全球戰略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雙重目標——既要維護單極霸權，又要維護本土安全。「九一一」事件對三角關係的直接影響是布什政府需要進一步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並且調整撞機事件後對中國採取的高壓政策。因為在美國試圖建立的圍堵恐怖主義的國際網路中，中俄兩國都有著明顯的地緣重要性。

在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即開始謀求改善俄美關係的普京，迅速抓住了「九一一」事件提供的歷史機遇，除了在事件第二天致電布什表示慰問外，還在2001年9月24日通過電視講話發表了五點聲明，表示願意為反恐行動提供空間走廊，不排除同意俄羅斯的中亞盟國向美國提供空軍基地<sup>15</sup>。

出於本國的反恐戰略需要，美國對俄羅斯合作政策也作出了積極反應。美國迅速減弱了對俄羅斯車臣政策的批評，而且連續進行了一系列美俄最高級會晤，意圖勸說俄羅斯同意修改1972年《反導條約》，在防止核擴散和反恐領域加強與西方世界的合作。2002年5月下旬，兩國元首在莫斯科會晤期間簽署的多項文件表明，俄美之間確立了反恐夥伴關係，俄羅斯默認了美國在2001年12月13日退出《反導條約》的立場，美國方面則以同意有限地提升俄羅斯在北約的地位，與俄羅斯簽署新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並且不再提及必須銷毀全部陸基多彈頭的《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作為回報。

同時，美國政府著手改善撞機事件後的美中關係。2001年10月布什出席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2001年12月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02年2月在《上海公報》簽署三十周年之際訪問中國，多次強調美國政府的「一個中國」原則沒有變化。美國學者對此評價說<sup>16</sup>：

在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受襲之後，布什政府開始將全球恐怖主義，而不是中國看作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最主要威脅。首先是在阿富汗開始戰爭，很快又試圖採取行動推翻薩達姆政權，以及其他目的在於根除恐怖主義網路的努力，使布什政府將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所形成的危險，以及對中東進行政治重建作為必須全神貫注的戰略優先方向。

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對俄中兩國採取的懷柔政策，對俄中兩國戰略協作關係產生

了深刻影響。

首先，美國政府在2001年12月13日宣布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實際上使1999年以來中俄之間最重要的戰略協作領域——兩國在反對美國研製和部署陸基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方面的合作——失去了現實意義，兩國只得被迫退守反對太空武器化的防線<sup>17</sup>；同時，美國政府將主要精力用於反恐，減少了對同樣具有恐怖性質和形式的車臣反政府軍的支援，減弱了車臣問題上對俄羅斯的壓力，使兩國聯手反對「科索沃模式」的現實緊迫感也隨之消失。還應該指出的是，俄羅斯政府在導彈防禦問題上向美國讓步，事前顯然沒有與中國政府磋商，這對兩國之間的相互信任產生了消極影響。俄羅斯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政府「怨恨莫斯科沒有及時向北京通報對待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問題態度的轉變」<sup>18</sup>。

在2003年3月20日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後，中俄兩國都在根據本國在伊拉克利益的輕重來確定反對這場戰爭的政策實施力度。例如，儘管中俄兩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一系列會晤中表明了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共同立場，但中國政府顯然迴避了在安理會與俄法德組成反戰外交聯盟。

因而，中俄美學者一致認為，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的重心已經由全球層面轉向地區（例如中亞和朝鮮半島）和雙邊領域<sup>19</sup>。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反恐的迫切性和長期性使美國不得不緩和與中俄兩國的關係，但美國當前面臨的恐怖威脅，在現實破壞性上還不能與她在1973-74年的西方經濟危機中敗走越南，1975-79年面臨著蘇聯的全球性進攻的威脅相比。恐怖主義的威脅沒有改變中俄美三國的力量對比，不能迫使美國在當前對俄中兩國作出類似1972-79年間對中國的戰略性妥協，因而不能改變美國維護單極霸權的全球政策。由這一判斷出發，美國在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北約東擴、車臣等問題上，以及在亞太地區加強前沿部署和台灣問題上，會收斂其咄咄逼人的強硬政策，並注意減少類似2001年3月和4月驅逐俄羅斯外交官和中美撞機事件那樣的激烈外交摩擦，但不會有實質的戰略變化。

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國家導彈防禦系統計劃將閹割俄羅斯的核戰略地位，北約東擴將根本性地封殺俄羅斯國際影響的地理空間，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表現出的單邊主義政策，美國對中國不斷增長的國際和地區影響力的遏制，在台灣問題上實質阻礙中國統一的立場，都說明俄中兩國與美國的矛盾是戰略性的，是難以掩蓋和克服的。因而，中俄兩國維護和保持協作關係的利益基礎和戰略需求依然存在。

#### 四 當前中美俄三角關係的若干特點

顯然，在後冷戰年代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美國對其總體態勢的演變始終起著重要甚至主導性的影響。這是因為，中俄兩國的對美政策不僅存在著靜態劣勢（實力懸殊），還存在著動態弱點，即兩國的國家大戰略核心內容，是迅速增強國力和為此必不可少的相對安全的國際環境，而兩國迅速發展本國經濟對外部市場和外部投資的需求，遠遠超過了雙方能夠互相提供的總量，兩國又都無法相互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例如，台灣問題這個中國的戰略軟肋，極大地消耗了中國的經濟和外交資源（武力防獨的準備和對銀彈外交的反制），嚴重削弱了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運籌能力。這都使雙方不得不各自尋找與美國緩和關係的途徑與契機。美國與中俄兩國任何一方較大幅度地改善與緩和關係，都會在客觀上削弱了中俄戰略協作的緊密

程度或改變其協作領域。

此外，當前中美俄三角關係，還有其不同於冷戰年代的若干特點。

其一是總體上的非對抗性。這是不僅由於中俄兩國不謀求與美國對抗，美國也在努力避免使中美關係和美俄關係惡化到對抗狀態。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如果美國未來在台海危機中試圖進行武力干預，美國與中國將會出現局部軍事對抗的風險。

其二是其非對稱性。在冷戰年代，橫跨歐亞大陸的蘇聯在地理位置和常規武力上佔有優勢，在核力量上與美國持平，美國則在總體經濟實力上佔有優勢，在地理位置上處於劣勢，在歐亞大陸上與蘇聯進行爭奪時，有兩大洋的阻隔，因而特別需要在撤出越南後借助中國保持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均衡。在後冷戰年代，這種力量對比的對稱性完全消失了，美國不僅在總體實力上遠遠超出中俄兩國的總和，而且迅速發展的軍事科技大為擴展了美國的洲際投放能力，兩個平行市場的消失使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影響覆蓋到世界各個角落。這種力量對比的非對稱性決定了當前美強中俄弱的三角關係的總態勢。

非全局性是當前三角關係的另外一個特點。冷戰年代的三角關係作用是全局和全球性的，從地理範圍上看，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擁有各自的軍事集團和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並在中間地帶——第三世界進行著激烈的爭奪。從三角關係作用的問題領域來看，它表現為軍事上的相互對峙，經濟上的相互封鎖和外交上的相互孤立（中國在其中只是部分地參與，或者說只是在亞太地區起到遏制蘇聯霸權的美國的夥伴作用）。

由於中俄兩國無論是在總體實力上還是在外交政策的影響範圍上都不構成全球性的一極，中俄與美國的矛盾也主要集中於國家安全領域，當前的三角關係遠遠不能覆蓋國際社會的所有問題領域，甚至不能覆蓋一些主要問題領域，例如經濟全球化問題、南北矛盾問題、全球生態安全問題，而在冷戰年代這些問題或者被兩個平行市場阻隔，或者被世界大戰的威脅所掩蓋和沖淡。

這種非全局性還由於後冷戰年代三角關係之外的國際行為主體增多，例如歐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作用，以及恐怖主義的全球體系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對國際事務起著獨立於中俄美三國之外的影響。

此外，應該指出的是，當前的三角關係還存在著某種利益共同性和非零和性。例如在發展經貿合作方面（這在中美關係中的表現最為典型），防止核技術和導彈技術擴散方面（冷戰年代激烈的核競賽掩蓋了在此問題領域的一致性），在應對日益突出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首先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這種利益一致性導致了當前的三角關係不同於冷戰年代的零和性質的非零和性質，即一方所得不再等於另兩方所失，而在上述領域有可能表現為三贏的結果。

## 註釋

- 1 Kenneth Lieberthal, "Triangular Thinking in the US 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US-China-Russia Relations, Beijing, 25-26 June 2002).
- 2 Elizabeth Wishnick,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a Change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hina Perspectives*, no. 43 (September-October 2002).

- 3 李學君、季卡廖夫 (A. Dikarev) 主編：《俄中關係：世紀之交時的求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278-79。
- 4 В. Михеев, "Кита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актуальны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6 (2003).
- 5 А. Козыр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 декабря 1992.
- 6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2年12月19日。
- 7 Jeremy D. Rosner, *The New Tug-of-Wa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5), 53.
- 8 USIS, 22 June 1994;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Daily Report* (91), 13 May 1994.
- 9 《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
- 10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Study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1996* (Cambridge, MA: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3-4.
- 11 Project cochairs, Zbigniew Brzezinski et al.,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U.S. Leadership Challeng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6), 145, 114.
- 12 А. Лари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 6 (2000).
- 13 James M. 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312.
- 14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Bush and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lovenia), 16 June 2001.
- 15 "Теле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 Путина", *Коммерсанты*, 25 сентябрь 2001.
- 16 Jonathan D. Pollack, ed., *Strategic Surpris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3), 3.
- 17 〈中俄兩國總理第七次定期會晤聯合宣言〉，《人民日報》，2002年8月24日。
- 18 同註4。
- 19 筆者在2002年5月30日《環球時報》上發表文章指出，2002年5月莫斯科會談後，中俄合作的重心開始向地區和雙邊層面轉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副所長米赫耶夫教授指出：「把俄羅斯的政策焦點放到美國，以及它謀求在國際新秩序中發揮與美國相同的作用，這些自然地使俄中關係降到地區級水平。」（見註4）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維什尼也指出：「在目前俄羅斯基於反恐聯盟選擇與西方的利益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的情況下，中俄夥伴關係被降級到了雙邊和地區關係領域。」（見註2）

鄭羽 1956年出生於瀋陽，先後就讀於遼寧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歷史學博士。曾為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里曼研究所作訪問學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